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文化理论与 现代性问题

[英] 阿兰·斯威伍德 (Alan Swingewood) 著

黄世权 桂琳 译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文化理论与 现代性问题

[英] 阿兰·斯威伍德 (Alan Swingewood) 著

黄世权 桂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英) 斯威伍德著; 黄世权, 桂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ISBN 978-7-300-16829-6

I. ①文… II. ①斯…②黄…③桂… III. ①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8201 号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英] 阿兰·斯威伍德 著

黄世权 桂琳 译

Wenhua Lilun yu Xiandaixing Went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5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0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编委会

主 编：周蔚华 金元浦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以绣 马学亮 司马兰 齐勇锋

祁述裕 花 建 张晓明 胡惠林

陶东风 章建刚 崔成泉 薛晓源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总序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相互交融，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文化已经形成一个产业，而且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群。文化产业逐步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艺术欣赏、广告、动漫、娱乐等等在内的文化产业，在为国民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享受审美、娱乐的同时，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把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到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高度来认识，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

与传统的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相比，文化产品作为精神产品，它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和运行规律。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健康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无论是对文化产业运行规律的认识还是对文化产品经营所积累的经验都还远远不够。而西方国家在文化产业理念、经营管理以及实际运作等方面都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探讨，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把这些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也可使我们知己知彼，提高我国文化产业运作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竞争力。为

此，我们邀请一些专家对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筛选，组织翻译这套“文化创意产业译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译丛”中既有在西方和整个世界影响巨大的名著（如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等），也有近年来在西方刚刚出版就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如《文化产业》、《文化与艺术经济学》等）。这套“文化创意产业译丛”是个开放的系列，我们将不断把国外文化产业研究的优秀作品纳入其中，也期待着各界向我们推荐相关的优秀作品。

当前，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趋势正在加强，这种国际化趋势使我国的文化产业融入国际文化产业的竞争大舞台之中，我国的文化产业公司与一些大的国际文化公司一起同台竞技，共处一个竞争平台，这无论是对我们的文化产业研究者还是文化企业的经营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这套“文化创意产业译丛”所引介的“他山之石”，一定会为建设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厦添砖加瓦，从而对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研究、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编选、翻译这套“文化创意产业译丛”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内文化产业研究界很多专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等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很多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编委会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见证了学术界对文化研究萌生出的浓厚兴趣。如果说异化、意识形态和霸权是早期的关键词,那么现在,文化就已经成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主要关注对象了。虽然文化在各人文学科中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一直以来,文化更倾向于被融入对文学与美学分析之中(文化作为背景和语境),或者被纳入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之中(文化作为社会化的过程)。对于作为战后主要学术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文化逐渐成为了一种身份和地位模糊不定的事物,常常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被作为特殊阶级和政治利益的反映来分析,不过它也成为标明人类价值和期望的重要领域。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是文学研究还是社会研究,其共同的特点是不能充分地对文化做出理论阐释,并且提出具体的概念,进而分析文化的内部特性、各种形式,以及文化与人类活动和现代社会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有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和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的大异其趣的著作,也有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设置],强调文化的社会属性(文化不仅关注艺术和文学,还关注传播和社区),但是依然没有生成一个必要的社会学框架和一整套概念工具。文化研究分化为媒介研究、女性主义和少数族裔研究等不同专业领域,这个过程受到新

的、大部分是来自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主体等诸理论的影响，这进一步使文化研究偏离了社会学。

然而，这些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拓宽了文化的定义，摆脱了将文化等同于文学和艺术的狭隘做法，现在文化也包括时尚和食物、运动和广告、杂志和日常生活，以及工人阶级的亚文化，这类亚文化的特征是形式多样的仪式和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抵抗。正如 E. P. 汤普森所指出的，文化是：

一个大杂烩式的术语，将如此之多的行为和属性塞进一个包裹中，势必混淆或者掩盖各种差异……我们要把这个包裹拆开，更加小心翼翼地检查其中的成分：仪式、象征模式、霸权的文化属性以及习俗在代际间的传承，习俗在历史上具体的运作形式和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演变。(Thompson, 1993, p. 13)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揭示文化的各种含义，并且提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学方法，以社会学的方式来讨论文化。因为文化对当代研究已经相当关键，它的定义受到范围大得令人无所适从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家的影响 [比如阿尔都塞 (Althusser)、福柯 (Foucault) 和鲍德里亚 (Baudrillard)]，语言学、话语分析和后现代主义一道推出了一些概念和方法，这些概念和方法与文化的社会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历史上的文化研究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具有自己的内部特质，与哲学和人类学关系紧密。在 18 世纪末，文化大多与文明的概念等同起来，被作为一种整体论的概念，比如世界观或者“心智”。雷蒙·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 将文化的原初意义追溯到“栽种”一词，表示农事方面的培植植物；但是到了 19 世纪，这个词指从初期的工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转变。在整个 19 世纪，文化逐渐提升了智性程度，被等同于思维习惯和人性价值，它是依据艺术和“高级”文化而不是“低级”或“普通”文化得到的理想的定义。在英格兰，文化以人性完美和创造一种普世价值为中心，建



立起一种美学和文学的话语，以其“甜蜜和光明”的情景反衬着非人的、丑陋的机器文明。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著作中，文化被定义为创造性的作品（文学文本），体现出高度的道德价值，反对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和庸人气息。因为文化承载着一种文明的使命，所以是社会性的，尽管它是基于产生高级和低级文化等二元对立模式的文本的狭隘构想。这种文化和社会传统在 F. R. 利维斯（F. R. Leavis）、艾略特（T. S. Eliot）和威廉姆斯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对其的首次命名造成了前工业文化（被称为“有机的”和以群体为基础的）与 20 世纪围绕着原子化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和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大大推动了文化的社会语境化，并且开启了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关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小众文化的争论。我在第五章探讨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文化的理想主义观念尽管与高雅艺术形式联系在一起，但毕竟也还是建立在共同体和社会经验的基础之上。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包括文本和共同体价值理念。用艾略特的话来说，是“一个群体特有的行为方式和利益”。文化是规范性的，它批判工业主义，肯定传统、普世价值和历史延续。

按照类似的思路，威廉姆斯也将文化从整体论的角度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与利维斯—艾略特模式相比，威廉姆斯的文化模式更加紧密地联系着日常生活。实际上，威廉姆斯试图将文化研究的文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泰勒（E. B. Tylor）认为所有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上，都拥有文化。文化并不与文明属于同一范畴，而是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所应当拥有的其他能力”（Tylor, 1958, p. 1）。通过价值认同和象征符号，个体就可以在整体内部进行交流并且建立起共同体了。早期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路径倾向于采纳功能主义的立

场，即价值认同和象征符号可以增进社会的凝聚力。但是这种整体观念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它和现代错综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社会及其所包含的多样的社会群体和阶级的关联。现代社会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问题相关，与社会冲突和斗争的复杂模式也相关。还有意义和行动的问题——泰勒的文化定义是通过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思考路径构想出来的，没有留心文化是如何形成这一问题。

当代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已经试图修正这种过分的唯物主义，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体现在象征符号之中的历史传承的意义模式，一种用象征形式表达的代代相传的概念系统，通过它，人们可以交流、延续和发展他们的生活知识及态度”（Clifford Geertz, 1973, p. 89）。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更加详尽的文化定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那些以社会学方法进行文化分析的研究者那里。该定义关注信仰、价值和象征符号，将这些视为文化的组成要素。

如果仅仅采用纯粹的内部方式，要把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和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区分开来就十分困难。在本书中，我不仅关注文化社会学，也关注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正如我在第八章指出的，社会学和现代性计划，与为文化自主和反思个体提供制度基础的高度分化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换句话说，文化是关于规范、价值和象征的；但也正如吉尔兹指出的，它也是关于意义和行动的。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将文化置于它的社会基础之中，置于现代性之中，置于它通过社会行动既体现又产生的复杂意义之中。

但是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的界限是流动的，并且常常重叠。例如涂尔干（Durkheim）在关于前现代社会早期宗教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文化，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指示系统产生出集体表征（比如图腾），个体由此获得与社会整体的认同感。集体表征是社会赖以实

现整合的一种方式。这里的关键是，涂尔干研究文化的方法强调的是象征符号对于个体成员的意义。同样，韦伯（Weber）也将文化定义为意义的领域，它是构成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的基础。在第二章和第四章我考察了韦伯和涂尔干的文化理论。韦伯提出了文化相对自主的重要概念，在现代时期，文化作为价值、象征符号和实践，拥有它自己独特的逻辑和结构。涂尔干凭借集体表征的文化观念，也试图建立一个部分自主的文化领域。文化的这个方面在行为互动主义社会学中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戈夫曼（Goffman）关于互动程序的著作中。该书认为，建立在仪式和共享意义基础上的具体象征形式使个体可以产生复杂的自我观念。

相反，功能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分析文化的象征形式（仪式、神话和符码）是为了探究这些象征形式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将意义纳入社会化过程中，实际上是把人作为行动者在文化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边缘化了。正如我在第一章指出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这种功能主义的视角，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外部物质条件的反映和对阶级利益的表达：文化好比社会黏合剂，将全部个体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黏合起来。然而，这种还原观念受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比如葛兰西（Gramsci）、阿多诺（Adorno）和巴赫金（Bakhtin）。第一章和第三章讨论的文化问题，是从文化与社会斗争和权力关系，以及与实践和意义的有机联系入手的。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是纠结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中的斗争场所，充斥着性别、种族和代际问题。文化不是阶级身份的表达或者表征，而是复杂身份的积极表述。

文化是意义、价值和象征符号的领域，它被置于特定的结构语境中。语境问题是文化理论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尽管文化是在语境中产生的，但是绝不能将其简化、等同为语境。在第六章，我考察了最近的一个社会学的语境理论，也就是布迪厄（Bourdieu）的场域概念，布迪厄试图将文化的部分自主原则整合进资本主义工业

化和社会变迁之中。布迪厄的文化概念，正如葛兰西的一样，将文化与社会斗争和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社会观念联系起来。尽管文化与意义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却不是固定和不变的；尽管与语境密切相关，但文化通过肯定社会生活不可化简的多样性而超越了语境。从帕森斯（Parsons）到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从韦伯、涂尔干到布迪厄、巴赫金，文化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论题是文化产生出普世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以某种方式超越了历史语境。在第七章中我考察了巴赫金的文化历史社会学，以及他提出的一种文化概念的尝试，xiv 这种文化不是单纯的社会斗争的产物，而是不同声音和立场之间对话的产物。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它表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和多重意义的领域。

雷蒙·威廉姆斯已经指出文化社会学是“紧随在阶级、工业和政治的硬题材之后进入社会学的‘最新入口’。它的发展不止是专家研究的松散集合，而是传播……媒体或者……艺术”（Williams, 1981, p. 9）。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处理文化问题的新型社会学——本书就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文化的理论化：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文化和经济生产 4

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批判 9

葛兰西：文化的独立自主 15

第二章

文化的理论化：韦伯、西美尔和社会行为 25

引言 25

理性和文化社会学：韦伯 27

文化和自主原则 30

西美尔：现代性和文化悲剧 33

现代性文化 35

第三章

文化工业的问题 40

文化的辩证法 43

文化工业和音乐 47

文化、阶级和批判 50

方法问题：文化产业和文化记忆 52

第四章

文化分析和系统理论 57

共同文化的概念：从涂尔干到帕森斯 57

共同文化：帕森斯 60

哈贝马斯：文化和交往实践 66

文化和互动 72

第五章

文化语境化 74

语境与文化 74

音乐语境化：介质问题 76

文化唯物主义 78

通常意义上的文化：共同文化的问题 80

情感结构：语境化的问题 84

第六章

文化场域理论 91

结构主义与系统概念 91

文化理论和短路效应 93

文化社会学与场域理论 97

习性、实践和文化场域 100

力量场域的概念 105

场域理论的缺陷 109

第七章

对话原则和文化形式 113

文化场域：行为与交往 113

巴赫金：文化、自我与对话 118

话语、语言和文化 122



非官方文化：狂欢式概念	131
对话原则、禁闭和历史语境：小说案例	135

第八章

现代性与文化

什么是现代性?	141
现代性 1：从波德莱尔到福柯	146
附录：现代性作为当下的“新”——福柯评波德莱尔	147
西美尔的现代性	149
现代性 2：启蒙批评——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	152
论述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	155
现代性 3：马克思	159

第九章

后现代性与大众文化

现代性批评 1：后现代和宏大叙事	165
现代性批判 2：后现代主义与文化	167
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和资本主义逻辑	173
总结性评价：现代性、历史和后现代主义问题	179
结 语	181
参考文献	187
索 引	192
译后记	199

第一章

文化的理论化：马克思主义¹

临近生命的终点，马克思被别人对他著作的深深误解激怒了，尤其是被那些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言辞激烈地抗议：“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以一种相似的打破偶像的精神，恩格斯也攻击了那些武断的假设，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关于经济和历史决定论的精雕细琢的理论而已：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宪法……各种法的形式……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② 同上书，695～696页。——译者注

经济基础和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产生特定的“历史事件”。但是恩格斯接着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①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倾向，是尽量贬低经济力量在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而十分看重“观念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宗教和哲学的观念。正是出于对这种反物质主义视角的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了经济力量的建构作用，并且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将文化归结为“观念的”领域，并将其作为经济决定性的附属。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他们的分析从抽象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转向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经验研究之时，总是会适当地强调“观念的”因素。在分析特定历史背景〔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1年）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中〕时，他们就十分关注观念和文化在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分析法国1848年的革命危机时，马克思注意到经济和政治结构与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多样性之间有一种各派社会力量的复杂平衡在发挥着作用，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文字中，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译者注